

## 两岸关系下的投票空间理论与战略三角理论

作者：石之瑜(台湾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 2004年8月12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作的学术报告



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知识和实际政治之间的相互构成的关系。即实际政治是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学问，而学问又如何影响到实际政治、实际生活的发展。政治学者如何在他的学问中体现他个人作为知识研究者的身份（不限于象牙塔中的也包括在社会上、政治上的身份），而他在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又如何影响到自己的学问。

我比较关心的问题是：西方、日本在研究中国的历史中如何凸现出西方、日本的学者在了解自己的身份跟国家、集体的认同过程中来透过对中国的研究表现他对自己社会的期许。这样的研究我觉得相当适合从中国研究中拿到政治学研究里来看，除了我们在一般的中国研究中看到中国研究者和中国这两个过程（我们把研究看作一个过程，把中国也当作一个过程）如何彼此互动相互强化，这样的思路也可以拿来理解政治学和政治学者之间的互动。

以台湾作为今天的切入焦点的话，显而易见在台湾政治学界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两岸关系。因此使得台湾政治学的发展就和两岸关系形成了一种紧密相扣、无法区分或者说是血肉模糊的关系。在学者研究中你很难判断到底这个研究是一个所谓纯粹、客观的学术研究还是它夹带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也就是政治学和政治主张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模糊，不易区隔。

我从台湾的经验来重读西方的政治学的时候，忽然间也惊觉到西方政治学发展过程中也有同样的情形。西方的政治学者和他政治学各种知识得以酝酿发生的社会背景彼此之间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互动关系。从台湾的情形来讲两岸关系的课题，老实讲我有时候都不太愿意深入的谈，尤其是近几个月。我记得台湾三月大选之前，广西社科院和我约好一选完就去介绍大选的情形，当时选完我去的时候就和他们说：我有春秋战国时代的亡国之民的感觉，都不太想谈两岸关系。不过如果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反省的话还大有值得我们深入检讨之处。

今天分成两个方面来谈，一个方面是政治学研究如何去影响到台湾实际政治的发展；另一方面再找一个理论或者一些事件来检讨两岸关系和台湾政治的发展怎么样影响到台湾政治学者所作的研究。

这些都和西方政治学息息相关，台湾主要的政治学就是美国政治学，讲得不好听是一种学术的指引，好听一点就是台湾的学者学习西方各种尤其是英语政治学界的观念、技巧，他的灵活性非常大，学习的速度非常快，有点像台湾的商人能迅速的模仿世界上各个名家的品牌，有时候在表面形式上做的更精巧、更漂亮，包括诸位马上联想到的台湾的选举。国外的朋友包括大陆学术界的同仁以及大陆在海外的一些民运人士很喜欢去看台湾的选举，当然这次是稍微出了一点状况，但一向是井然有序，譬如投票怎么投大家好像都是生活常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台湾已经接近先进民主之林了，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说：你们常常认为台湾投票投得这么好，甚至比西方的民主国家还要好，投票投完了两个小时就知道结果，整个电脑连线，算票等程序都是井然有序，包括民政部的同仁在设计乡村选举的时候整个投票过程也参考了很多台湾方面的经验，但这是否就是所谓的民主？我问西方的学者说：“在你们的经验里有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不按照宪法来运作而能称为民主国家的？”他们听了就愣了一下，宪法当然讲的是有宪政府。“有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从它的领导到它的人民从没有把有宪政府这样的观念放在心里，当作是政府施政或者人民监督政府时的一个参考依据而仍然能称为民主国家的？”这个问题让他们思考了一下。我的意思就是台湾的选举其实和台湾的政治学很像，它从西方翻过来，把表面上所需要所有的技术统统学过来而且学得更好、发展得更精致。但这完全不能够代表台湾选举文化之下的民主发展就是往西方意义的民主在发展。

台湾政治学长久以来因为我们都是留学美国的，我们回到台湾后要用美国的政治学来看台湾的政治以及从台湾看世界的时也是用美国政治学的角度看世界。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社会心理因素在里边，台湾同殖民地脱离以后又经过了内战以及冷战的发展，一向在世界的位置是非常卑微的。台湾的学者去西方学习一方面背负了殖民地的心态，同时也有近代中国以来的崇洋媚外以及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信心的背景在里边。学到西方的学术语言之后回到台湾，很自然的要用西方的学术语言来和当时台湾的绝大部分还没有留过洋的本土的学者进行沟通。他所采用的语言当然是本土的学者不能够理解的，而他采用的语言

往往是问台湾的政治发展有没有在跟西方已经产生的政治理论规律在走。如果在20年之后回想，一个政治学的法则从欧美近代历史发展经验得出来以后，如果作为一项法则当然应当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假如它拿到台湾来有些地方不适用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会问到底是这个法则有问题还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西方学者千篇一律会认为是这个社会的有问题，因为人类的行为法则照说是普世一致的，如果欧美社会能够从封建走到现代化的时候，它的政治能够民主化，所有还没有进入现代化的社会理当走相同的阶段一步一步的往现代化、民主化的社会走，没有走成的话就要来看一看这个社会缺什么，可能是司法不独立、可能没有反对党，它有种种的标准根据欧美社会自己发展的经验来解释台湾社会，看你哪些东西没有。如果从西方回来的学者也是在这样的参考基准下来解释台湾社会。当时台湾本土的政治学界和当时的政府、统治领导当然是结合在一起的，霎时间无论是台湾的政治学还是台湾的政治发展都成为这些留洋回国的年轻学者检察、针对的对象，变成了一个被检查的对象，被检查的人无法用本土的语言来和留洋回来的政治学者进行沟通，因为这样的沟通本来就揭露了自己的不堪：原来对西方的政治学不熟悉，讲英语的时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方音，原来西方所讲的抽象理论在概念上无法和我自己所学的结合。在沟通中产生了一种隔阂，背后隐藏了一种心态就和年轻学者去和他的美国导师沟通时是一样的。这就产生了一个尴尬，当我用西方自由主义的、科学主义的政治学语言解释台湾社会的时候俨然就取得了一个不需要证明的先进的优势，在这个位置里所做出来的政治学研究，不是这些年轻学者过去年轻时他们的老师辈所能回过头来反省检讨的，因为它们好像超过了议程。如果有外国的学者到台湾来研究台湾政治发展，我们这些留洋回来的人和自己的老师在沟通的过程中很自然的一定要用在美国学的政治学术语和架构来分析自己的社会，这个分析使得台湾这个好像完全陌生、难以理解的社会可以立刻被自己西方的老师好像已经透过科学的语言已经掌握住了。他可以不会说台湾话，不了解台湾的政治人物，不认识任何一个台湾领导阶层的人，不了解台湾过去、近代以及近来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依然可以宣称掌握了关于台湾政治的知识，那么这种途径当然是通过我们这些学过西方语言、理论框架的人完成。作为我们自己夹在西方和本土社会之间，采用西方的语言不得不成为一种身份上的策略。如果不采用西方的语言，我告诉我西方的老师说你的框架、法则放在我们这个社会有些问题哦，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有些什么样的现象，一旦进入实际现象之后就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深的要把台湾具体案例、事件讲给我的老师听，他听得一头雾水、眼花缭乱，开始怀疑到底这位回到台湾的学生是他的同仁还是他的研究对象？为什么会说出这么一大堆陌生的、和理论框架无法结构在一起的语言，我作为他的学生在这接触的过程中从他的同仁调回来成为被指指点点的对象。为了避免这样的身份尴尬我当然要不断地用西方的语言来和我的老师沟通。那么这些从西方回来的学者训练出来的大量的、一代又一代的台湾政治学者，包括我们自己与政府各阶层的领导、各种政府政策的研究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台湾政治学界一定程度上和大陆有个共通性和西方不同，主要的研究经费来自政府而不是来自知识界本身，知识界、学校本身没有雄厚的财力来支持学者来做纯学术的研究。大量的资金如果来自政府的话，当然研究的导向会和政府的施政息息相关，当我们把西方各种各样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语言带进了我替政府所作的政策研究以后，政府在公众场合所使用的语言就被这些从西方回来的政治学者所渗透甚至主导。因为政府的工作人员也要学习用这样的语言，否则就无法在公众场合谈论很多问题。到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举一个有趣的例子：过去立法院在审议总统选举罢免办法的时候，在辩论一个问题，总统选举的时候投票时要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这就有很多的辩论，有一位立法院院长他是国民党中常会的委员，在辩论的时候就站起来洋洋洒洒照幕僚给他准备的资料讲了七点主张相对多数的理由，结果他的结论是主张绝对多数。他坐下以后大家就很疑惑问他到底是主张什么，他说是绝对多数。道理很简单，到底是相对多数还是绝对多数他也不知道，他肯定要根据政治上伙伴的需要来做决定，那么相对多数、绝对多数的理由到底哪个是支持哪个的他也搞不清楚，当时拿错了就念错了，被《联合报》当作是头版下面的新闻来报道。这就可以看出，政治人物受到很大的压力，他必须要在西方政治学的语境里表达他的政治主张，甚至是他的政治主张和西方的政治学语境毫无关联，可是影响却是无所不在。包括台湾政界人物、政府里做政策规划的公务员也要到大学上课，学这些语言，以及政治学界的同仁包括我个人以及我们的学生全部笼罩在西方政治学语境里。这时，政治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很有趣，我今天就先举个好玩的例子。

美国的政治学最主流的就是美国政治研究，所有政治学的理论都是从美国政治学这个学问发展出来的，所以美国政治学和政治学的方法论在美国的政治科学界一定是和起来教的。去看找教书人的广告，教美国政治学的人一定要教方法论，因为美国政治学是普世的政治学，研究美国政治学的方法就是研究普世政治学的方法。可以去每一个学校看，教美国政治的人就要教方法论，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美国政治学方法论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就是：国家和社会是分开的，国家是服务于社会的，国家许多政策的主张、政策形成都是来自社会，所以就有政治体系的分析、政治文化的分析、分析选民如何把自己的意见形成政纲透过政党输入到政治体系中去，政治体系的人如何根据政纲来执政，执政得不好的话回馈到社会，社会通过下次选举把执行不好的人换掉，所以整个政府的国家概念要反映社会的需要，它有国家和社会分离的概念在里边，在这个概念之下主流的美国政治学期刊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叫做中间选民理论。

什么是中间选民？美国是两党政治：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选举战场上两个党竞争的时候如何能赢？必须争取到第51%的选民就赢了，让它超过50%的那一个人就叫做中间选民。如何争取到中间选民呢？政党就要想尽办法把它政策的位置和中间选民尽量靠近，美国政治的假设是政治人物、政党必须要反映选民的意愿，选民散布在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空间中，保守主义在一端，自由主义就在另外一端，所有的政策都会透过统计的相关性分析归纳成由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组成的向度里。如果是辩论枪支管制，反对管制就是接近保守党的，主张管制就是接近民主党的；如果辩论堕胎问题，赋予堕胎权的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党的，反对堕胎权的就是共和党；主张减轻社会福利的就是保守主义，主张社会福利多一

点的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党。虽然辩论很多的议题，但这些议题经过归纳可以放在一个向度上，就是从自由主义到保守主义。政治学家发现这个特色后就发展成了空间理论，空间呢就是假设选举的议题可以透过数量化，把候选人和选民的政策的位罝放在一个从0到1的向度上，假设自由主义是0那保守主义就是1，根据你在譬如说枪支管制、社会福利、外交政策、堕胎等政策上的立场，归纳出你在0到1的大概位置，譬如有的人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大概是0.3，有的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的大概是0.7，极端的就是0或者1。选民在选举议题的空间上的位置站好后，政党的领导人就可以判断中间选民的位置会在哪里。假如社会的气氛比较倾向保守主义的话，中间选民大概就在0.57的位置，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话大概就在0.44、0.48这样的位置。政党候选人要抓住第51%的中间选民就要把自己的位置调整到0.57或者0.43就可以抓到中间选民，就把你的对手挤到第49%的位置你就赢了，双方就要在中间的位置去挤。为了挤到中间选民就要把自己的极端自由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立场尽量温和化，温和到可以掌握中间选民的位置我就赢了。

中间选民理论也叫选举空间理论。选举空间理论叫做the spatial theory of voting，候选人要如何拿捏自己的位置。中间选民理论叫做The median voter theorem，具体的理论主张分成两点：一个是比较松的，一个是比较紧的。

比较松的中间选民理论认为最后赢得选举的政策一定是中间选民选的政策，即中间选民不一定选到他最喜欢的政策。中间选民基于政党的位置、各种咨询以及各种原因，可能不能够选到自己最喜欢的位罝，但他选的位置一定是获胜的位置。中间选民投到哪一边，那个位置就是最后政策的位置。这是指在多人选举的情况下，多人选举单一议题空间。比如有5个政党在保守主义、自由主义0到1之间，谁能够掌握到中间选民谁就赢，中间选民最后投的位置就是最后获胜的位置。

比较紧的就是说在一对一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喜欢的政策位置最后一定会当选，这就比刚才的严格，刚才的是说中间选民喜欢的不一定有这个位置，但是他所选的位置一定是赢得位置。比较紧的中间选民理论。适用一对一的选举情况之下中间选民喜欢的政策最后一定会当选，这就比刚才的严格，刚才的是中间选民喜欢的位置不一定有，但是所选的位置最后会是应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并不一定是他喜欢的位置。比较紧的是在一对一的选举，中间选民喜欢的位置就一定是当选的位置，因为大家一定要往他身上靠，掌握他的人就能赢，所以中间选民就不动如山，两边政党都要来巴结。

中间选民理论在美国政治学界是最重要的理论，因为它很简单而且每次预测都对，很简化可以量化。量化从两个角度来说：一个它不需要统计数字，完全是个数学模式从0到1，就可以算出结果；第二是可以量化，可以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来收集选民的位置，归纳出0到1的位置是什么，所以它很科学。政治学家在经济学家眼前是很自卑的，经济学的数学模式很厉害，物理学念不好去念经济学、经济学念不好去念管理学、管理学念不好去念政治学，政治学家只要会代数就好了，哪一个物理学家拿一个三角函数政治学家全部举白旗投降，觉得是最伟大的政治学大师。台湾也学习美国政治学的风潮，所以什么东西是量化的就是最好，中间选民的理论当然也就到台湾来。大量的社会量表来发现中间选民何在，研究方法也引进台湾，用掉台湾政治学界最多的资源，光是做社会调查所用的资源就超过所有台湾政治学界所有可以用来做研究的资源的一半以上，也就是很少数的大概5%的人掌握了50%以上的资源做这个社会调查。社会调查随着台湾选举的发展就越来越流行，不但学术界做、政府的研究考核委员会做、每一个政党都做甚至个别的候选人也开始做社会调查。在近5年发展，每一家报社、每一家有资源的电视媒体都做自己的社会调查去找中间选民在哪里。

中间选民理论是美国政治学界的理论，如果我们坚守中间选民理论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们拿这次2004年的3•20大选做判断，3•20大选完全符合中间选民理论最原初的形态，是两组候选人对决，只有单一的一极就是统一和独立，所以照中间选民理论双方应该尽量把自己的位置温和化，去找寻选民在统、独的0到1的位置上到底在哪里就尽量把自己位置温和化。但是任何稍微注意这次3•20大选的同仁都会发现当选的陈水扁从2003年暑假开始就采取了最激进的政策，激进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同他2000年的大选作比较，2000年大选的时候他的选举策略是尽量的温和化，提出什么新中间路线、模糊统独问题、国家安全至上、绝对不会推动台独等各种理论，让大家一定要放心，当时是三组候选人，根据选举空间理论（它本身也有很多的变种，一旦不是一对一的选举逻辑上的变化就非常大，尤其是你两个议题空间就更复杂），2000年大选的时候是两个议题：要不要改革和统独问题。在统独问题上三个候选人都尽量回避，这很有趣，照理说有三组候选人的话应该先掌握住自己的核心选民，再另外开辟一个议题空间把和你在中间选民有竞争的政党在另外一个议题上把它变成是极端的政党，但陈水扁没有，他在2000年大选的时候非常模糊。而在2004年大选的时候他非常激进，一下推动公民投票，想要通过公民投票把台湾俨然变成独立于大陆之外的主权体，通过各种各样的选举语言指责选举对手是中共同路人，说这次选举就是选台湾还是选中国，尤其在选举造势的场合用各种各样非常激进的、非常不道德的手段把选举升温成、激化成一种统独的对决。在国民党的选举策士里这是好事，一旦你变得这么激进就丧失了中间选民，但从7、8月开始，在不同的选举民调中可以看出那时陈水扁大概落后15—20个百分点，采取激进策略以后到9、10、11月就看到他的民调数字不断往上攀升，所有的其他议题从8月开始越来越少，到11月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没有其他议题存在了，陈水扁的民调追上来，变成差距只有7—8个百分点，也有多一点的12个也有少一点的3—5个百分点，但是各家的趋势非常明显，他一路追上来。这不是和空间理论讲的完全相反？当时我个人觉得空间理论有问题，我了解当时国民党的策士几乎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民进党的策士好像没有什么从美国回来的，充其量只是台大自己训练出来的研究生，都是在乡野的选举场里混过不知道多久的，还有就是老一辈、老台独为首的包括李登辉、李洪喜这些人，他们当然没有念过美国政治学。国民党的候选人就坚信中间选民理论，所以他们在统独的问题上认为不能表态，要往中间

靠。各种社会调查、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在统、独的问题上比较不愿意选边，所以你问他是支持统一还是支持独立还是都不支持还是无所谓，大多数人都在中间，所以国民党说他们在中间我也要在中间，要靠近他们，这就是美国的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理论，社会已经有了位置所以国家、政治人物要在中间选这个的位置。

当时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和国民党的一些同仁谈过这个问题，我和他们说我在看民意调查的趋势时我怀疑：并不是从统到独是一个单元区，统是一个单元区、独是一个单元区，是两个向度，假如说竖轴是统横轴是独。所以就没有可能是又可以统又可以独，或者是既不要统又不要独？我怀疑有这样的情况，原因是陈水扁一路追上来。我就有一种理论的假设，西方政治学理论中所谓中间选民在所谓的统独问题上其实是彷徨的选民，所谓彷徨就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是要统还是独，他很彷徨，需要有人给他指引。国民党如果说：你是很彷徨的选民，让我变的和你们一样彷徨你们就会选我了。从对人心理的理解好像并非如此。不是我感到很彷徨那我的领导人说让我变得和你一样彷徨所以你可以放心选择我，这好像和人的心理不符合。

因为我教政治心理学，我就了解到在政治心理学里有个认知不协调理论，根据这个理论人的情感和他的认知关系之间应该要一致，假如我喜欢一个人，这个人的主张和我不一样，人就会产生情感和认知上的矛盾，人必须要把这个矛盾加以调和。所以很多政治心理学家就透过空间这个理论，这些空间理论家用同一批资料去做研究，用这些资料去认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这种解释空间理论可以被认可，认知不协调理论也可以被认可。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发现：选民对于他所喜欢的候选人的政治立场会把它曲解成和自己比较接近，比如说选民的立场是0.4，候选人立场是0.7，假如这个候选人是我喜欢的，我就会把他的政治立场误读、误以为是0.5，把他的政策立场解读成和我比较接近，这就和空间理论不太一样。另外更重要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假如我喜欢的候选人是0.7我原来的立场是0.4，我有可能去调整我的政策立场以便来改变我和他在政策上的空间差距，我就被我的候选人带着跑，就是说我喜欢候选人，我就会调整我的政策立场，以便来处理我在认知和情感上的不一致。假如这个理论拿到在台湾来看的话就要进一步去问，到底是空间选民理论和认知不协调理论哪一个更适用。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到，台湾是一个殖民地解放出来的社会（照台独理论还没有解放），在殖民过程中日本殖民者不断把台湾人当成是清国奴对待，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夕日本人在台湾发动“皇民化运动”，把台湾当地居民变成日本天皇的子民。这过程不只是个形式而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历史过程。一开始有“生活习俗改造运动”：就把台湾人（当时叫清国奴）喜欢随地吐痰的习惯纠正，要罚钱；到你家里看到家里的窗户只开了小小的口，就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大口和你说下礼拜来要把窗打大，因为通风不容易得肺病；走在路上看到什么样的人要如何鞠躬，不对就可以惩罚你。很严格，对台湾老百姓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接着就有语言运动，日语家庭、小孩开始念日本的学校、在家里讲日本话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小孩长大了可以去日本念农、医、行政。很多早期的台湾知识分子通过念行政来念法律，无独有偶，诸位可以发现战后隔代遗传的话，今天知识界领导台湾独立运动的不是念医的就是念法的不然就是念农的，有一些非常有趣的隔代遗传因素在里边。“皇民化运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日本人不是清国奴了，清明把大家叫起来把祖宗牌位丢到中间去烧掉，中国人祖先就烧掉了，在祖宗牌位上供奉日本的天道大神，有的地方是把祖宗牌位放在神龛后面前面是天道大神。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动员的过程，不是一个随便讲讲的过程。所以台湾人在日本殖民的后期就变成日本人了，瞧不起中国人。二战后台湾回归国民党去统治，你是清国奴现在来统治我？！而且清国奴还告诉我：你是皇民？你怎么做皇民？是非常不道德的！台湾人就产生一种很大的困扰：如果他是中国人他瞧不起他自己，他的整个文化视野是日本的，就象今天我们从美国回来的一样跑到台湾用美国的视野去检视台湾，他是用日本的视野看国民党的统治，怎么看国民党文化上是落后的。但另一方面自己又是中国人，他觉得他被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的身份有问题，就夹在某一种又自大又自卑的困境中。这种困境是历史形成的一种东西，不断在历史的过程中进行文化清洗，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原地移民》，他的心态和移民差不多，但他从没有移民过，都在原地，他要不断的去适应新来统治者的文化身份而产生这样的困惑。一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在台湾说我们是中国人，绝大多数台湾老百姓觉得是合情合理的，但你和他们讲我们不要做中国人好不好？他又有这样一种情绪，因为他觉得中国是落后的、肮脏的。

我记得台大政治系的系主任有一位叫彭敏敏，在1996年还参加总统大选，是台独的很重要人物，后来通过美国CIA的帮忙偷渡到美国去，90年李登辉大赦，他回到台湾。按照台湾人的习俗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站起来，所以第一场公开演讲就在台大政治系的大礼堂，讲到台湾统一时他说：台湾要统一也要找个卫生的民族来统一。学生在下面就哄堂大笑，年轻的学生听不懂他什么意思，我一听就很能够理解，卫不卫生对日本人来说就是一个文明高下的问题。

有次我在旧金山开会，谈到两岸关系有一位华裔的学者在台上讲，下面有一位台籍的学者听了很不高兴，他在讨论的时候举手说你们这些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人来了把台湾的文明变得很先进，帮我们造公共厕所，把台湾弄得很干净很卫生。华裔的学者说：你讲得没有错，日本人比中国人卫生，帮你们造公共厕所是好事，但你是中国人阿，你应该把自己搞干净，怎么能人家给你造厕所你就要做日本人呢？台籍的学者很生气，站起来气冲冲的就走掉了，当场很尴尬。

形成今天主张台湾独立的人早期的旗我们叫“八炬旗”，就是日本的旗子。台独联盟在周六、周日租的吉普车在大街小巷上转的时候放的歌就是日本军歌，所以他们和日本的关系是绵绵密密。

这些知识界的领导所领导的台独运动，以及他们影响越来越多的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看法，基本从日

本的文明视野出发来看中国，中国什么东西发生立刻就把它解释成一种文化上的落后、肮脏、不卫生，而且很快的去解释。但是自己生活的周遭呢，过年过的是中国年，吃的是中国菜，各方面都显示他是中国人，就产生一种身份上的困惑。国民党统治的时候把日本的东西压得很低，国民党里出现的像李登辉这一支受到日本的影响非常浓厚的领导人，对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的影响就是对中国的看法需要透过对大陆的某一种冲突来证实台湾在文明上是比较高的，台湾是民主的所以台湾一定要办选举，台湾各方面一定要超过大陆，一定要和美国接近，一定要用美国的眼光来看大陆，台湾就俨然变成美国的同仁、同僚、同伴而不是美国的对象，可以和美国一起把大陆当成是要被改造的对象，这种情绪的兴起当然也有国民党内战打败的卑微意识的影响，让台湾人在身份意识上感到一种很大的自尊。所以一方面你和他说是中国人他说是，另一方面说你不要做中国人他也觉得不要做中国人。让我觉得台湾的统独问题不是一个从0到1的问题，是两个单元区，有一个统的单元区，有一个独的单元区，人们夹在中间。有人觉得不要统也不要独，这两个对我都不好，我如果主张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很落后；主张独的话我又觉得我不做中国人心里觉得不对，所以你不要和我讲统独，我统统都不要；另外有一批人呢觉得统也可以独也可以，你不要让我煎熬，只要说一国两制可以保持现状不变我也可以接受，你如果说台湾独立以后两岸可以维持永久和平我也可以接受，你给我一个就好，你不要再和我扯别的。但是我不知道这种人有多少，如果设想这是两个向度的话当然有一批人是又统又独，一批人是不要统也不要独，也有一批人是统而不独、独而不统，可以区分这四种人。我和丁守仲（国民党智库重要成员）聊天说，你要注意如果可统可独的人占5%的话，一来一去就有10%。连战和人家说我不知道要统还是要独，那这些可统可独的人就不会投你票。如果陈水扁坚定地和他们说独立完全没有问题而且现状就是独立，我只要维持现状，那这些人就投陈水扁了，因为他给了他们一个方向。丁守仲当时怎么回答我的不记得了，但我的印象很强烈他就是用空间选民理论来回答我说这个问题不是我想得这样，选举当然是国民党输了。

到了2003年8月做了很多社会量表调查，差不多到今年6月多的时候资料都整理出来，我就很好奇，就想看有没有这种人，我就拿了其中一个题目：假如大陆和台湾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都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应该推动两岸统一同不同意，相当多的人同意；另一个题目是说假如台湾独立可以维持和平的话应该推动台湾独立，也相当多的人同意。这一部分人如果我印象不错的话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我就觉得很有兴趣，就去量表中找其他和统独相关的题目，每一个题目上都有这种可统可独倾向的人，但是人数不一，像刚才的题目人数超过四分之一是很多的，也有的题目人数很少，但是既不要独也不要统的人数很多的也有。当时就觉的是证明我讲的了，我把10个题目找了出来，其中有5个测统的倾向，有5个测独的倾向，当初设计题目的人各有各理论上的目的，这10个题目本来不是摆在一起的，设计方法也就不同，但对我而言都是测老百姓对大陆的情感倾向和对台湾独立的情感倾向。所以把它们的答案作统计相关性分析，分析出来果然有两个单元区，但是再进一步一看和我设想的统的一个单元区、独的一个单元区又有不同，它不是说有一组答案在独的问题上是正，另一组答案在统的问题上是正，它并不能把答案区分成这两组，如果能区分成这两组就对了。在统的问题上有一组答案和统是完全正相关的，和独没有关系，而另一组答案和独是正相关的，和统的这些题目没有关系，这就对了，这比我原来做的理论预测更好。它是两个什么单元区呢？其中一个单元区和统是正相关，和独是负相关，这和空间理论预测的是一样的就是0到1的关系。有一大组的答案在统的问题上倾向1的话，在独的问题上就会倾向0，这和空间理论预期的完全一样，这就表示台湾是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在统独之间作选择的。但是出现了另外一个向度，这个向度是在过去做台湾统独选举研究中从没有发现的，发现这个向度上的答案和统是正相关和独也是正相关，那是什么意思呢？它不是统是0独是1，假如1这边是可统可独的话，0这边就是反对统也反对独，中间就是统而不独和独而不同的人，在第二个向度上发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向度，这个向度如果放在统和度的空间上来看的话：第一个单元区就是斜的一条线，统的人反对独，独的人反对统的，第二条线是这样上去的就是主张可以统的人也可以独，反对统的人他也反对独，中间的那一批人就是统而不独或独而不统的人，这两条线的交集是统而不独、独而不统的一批人，但是它的强度比较弱。在原来第一个面向上，统独对立的人比较靠中间的那一批人，虽然统而不独但是他统的倾向很淡，不独的倾向也很淡。独而不统的人独的倾向比较淡，不统的倾向也比较淡，所以集中在中间。在另外一个单元区可以看到可统可独和不统不独的两批人，中间就是统而不独和独而不统的人。从第一个单元区上你可以发现，在第二个单元区上统而不独或独而不统的人倾向都是比较淡的，因为他们在两个单元区的中间。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陈水扁的激进的台独政策可以追上来，因为他抓的是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第一个单元区的人已经定了，主张统的人当然是投国民党的，主张独的当然投民进党的，这根本没什么好谈的。台独政策抓的是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他把可统可独的人能抓到了，因为那部分人国民党、连战已经放弃了，陈水扁把主张不统不独坚定维持现状的人也抓到了，因为陈水扁说：现状就是台湾独立，我不会改变现状不会宣布台湾独立。所以对于那些在第二个单元区上的人他也不错。

我们可以把决定选民投票倾向的因素分成两个：第一个就是统独因素第一个单元区；第二个就是对现状的安定感。对现状安定感越强的人反对你走任何往统或者往独的路线，说一国两制以后台湾绝对维持现状要不要？不要；说台湾和大陆在各方面已经完全发展成一模一样的社会了统一要不要？不要；说两岸绝对可以维持永久和平我们来独立要不要？不要。这种人对任何变迁都抱有怀疑的态度。另外一种是可统可独的，连战也不要这种人，因为连战说：“一边一国也可以，台独也是选项不要排除统一吗”。但你到底要什么？“我现在不知道将来再说。”所以他既不是可统也不是可独，又不是不统又不是不读，那不是把第二个单元区的人都放掉了？然后在这样的背景下再来理解枪击案就很明确。枪击案打的是陈水扁，他是坚定的维持所谓台湾独立现状的候选人，打他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选举只剩半天，枪击到底什么意思，谁也不知道，造成选民很大的不安，选民不安的时候他就要回归到他最熟悉的位置上去，那么这些对现状感到极度安定的就要坚定维持现状，他看连战，连战有可能主张统一，他不要，假如他认为说台湾非独立不可，打的是陈水扁，陈水扁主张独立的话台湾非独立不可否则台湾完蛋了。你看连战，连战没有办法提供一个参考依据让人家来理解枪击案，无法让人家来解读枪击案到

底是什么意思。陈水扁就提供给大家一个解读的机制。因为我主张独立所以一定是主张统一的人对我下手或者说陈水扁主张维持现状，所以一定是反对现状的人对陈水扁下手。所以枪击案就对一部分不是极端的人产生牵引作用，为了维护自己心里的安定就转过去了。所以从空间投票理论和中间选民理论不能解释台湾的选举，不能解释选民的态度，同时还误导、影响了国民党的选举策略，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影响也对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这是我对中间选民理论和选举空间理论的反省、检讨。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是台湾的实际政治如何影响政治学理论的发展。

我选的是战略三角理论。今天几乎说台湾研究两岸关系、研究国际政治的，好像没有人不谈战略三角。这三角是：华盛顿、台北和北京。有的人听起来觉得很好笑，这哪里是什么战略三角，主要是美中关系，台北怎么能提升到这个层次来看。我觉得这件事也不能简单的去理解。因为我们发现台北在北京和华府之间的关系起了非常非常多的一种引导甚至是指导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北京和华府预测不到的，就像这次公民投票，他们就预测不到台北在这么强大的压力之下能坚持进行，而坚持进行之后又使得不少的美国的战略家觉得北京当时对公民投票抱的严肃态度让美国感到谨慎，极大的压力压在台北身上，但是台北照做，照做了以后华府不能如何，北京也不能如何，反而使得华府重新思考北京到底有多认真多严肃，这等于是在台北的叛逆性的行径中去刺激北京重新思考。所以这到底是不是一个三角关系是很值得研究的。

今天特别值得我们分析的是：台北在美中关系上产生任何具体的实际效果之前，三角关系就成为台北学界非常钟爱的理论。为什么台北学界对三角关系这么钟爱？诸位都了解，台湾在国际上没有正式的身份，可是在三角关系里台北是和北京、华府平起平坐的，这个战略理论非常重要，重要到它变成一种身份策略，台湾的政府界也好学术界也好，把对自我的认识在理论层次上提升到和华府、北京是平起平坐的，而在实际的政治发展中，我们发现这种意识其实是起了作用的。国际上的学者到台湾来，和台湾学者对话的时候，讲到国际政治没有人不是现实主义的，每个人都是讲权力均衡，讲来讲去都是这些，他们对话起来得出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照美国的学者讲美国在世界上的兴起会不会让台湾在政治上有所转变？按照权力均衡的理论、尤其是战略三角的理论，当一罩特别强的时候另外两罩要合作来制衡它，有些美国学者就担心这样的问题。陈水扁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可能性，包括早期蒋经国开放探亲，等于对美国做讯号，不要以为两岸永远都是对立的。因为开放探亲是在1979年华府在和北京建交之后，对台北国民党统治的正当性造成莫大的震撼，不可能反攻大陆了你们这些人还在台湾统治个什么劲？蒋经国为了维系他统治的正当性必须要使得台湾和大陆取得某一种关联，让老兵回来，建立文化上和血亲上的联系，一方面制衡台独，另一方面也警告美国人不要以为台湾是铁板一块，永远反共。这招陈水扁不是没有用过，他在这次选举过程中有一次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纸条读，他说他的2000年大选就职演说根据北京某些人的建议，这张纸条我到今天一直放在身上。这等于告诉美国人说你不要以为我和大陆就没有关系，而且我还可以照着大陆的指示来讲这个你没有想到吧，于是让美国人不要给我太大压力，不要以为我不会转向。所以陈水扁不是没有玩这种把戏，可是从宏观的结构来看他是玩不出什么太大的把戏，因为台湾要和大陆建立某一种战略上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从他坚定的台独意识和整个台湾的发展方向，过去十几年的定位和走势来看是不可能的。

依照战略三角理论，现在有两种不同的理论，一种对我最好的情形就是这三角的关系都是正的，在三角战略理论术语中叫做三边夹足系。三边都是正的话，对于三边而言它的得分都是正二。假如正面关系都是一，负面关系都是负一。三边加起来都是正二，总和是正六，三边都是好的而且是稳定的，所以有人认为三边夹足系最好。但是其他学者认为不对，因为三角关系是扑朔迷离、尔虞我诈的，不但是我这边要正，而且你们要是负的我才觉得更稳定。有的人认为说三角战略最好的位置是另外两边和我都是正面关系，你们两边在打架，这叫做枢纽位置。所以三角战略专家常常辩论到底是三边夹足系是稳定的三角战略关系还是枢纽？枢纽一定是不稳定的，因为别人要破坏。三边夹足系能不能稳定呢？其实无论怎么辩论，这两个之间有个共通性：三边的关系如何决定是三边互动的结果，是三边尔虞我诈、和纵联横的结果，和两岸关系不大一样。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关系是负一，这是不能改变的，这种不能改变的双边关系能不能称作三角战略理论呢？台湾不可能为了挑拨美国和大陆的关系而建立台湾和大陆的正面关系，把台湾变成枢纽位置是不可能的。而且事实上显示，台湾不断的要让美国成为枢纽，要破坏美国和大陆的关系，而美国要维持和大陆的关系，美国成为举足轻重的枢纽位置。但如果从历史上来看也并非如此，从冷战时期开始，1958年有金门炮战，其重要因素是蒋介石坚持不顾美国杜勒斯的建议要把最好的军队放在金门，目的就是告诉台湾老百姓我是要反攻大陆的，因为如果他没有这个姿态，把金门丢掉的话就表示他不要反攻大陆，那他在台湾的统治个什么劲？必须要把重兵放在大陆表示他要反攻大陆的决心是不变的，而按照美国的战略绝对不答应，希望蒋介石不要把重兵放在大陆。爆发8·23炮战美国第七舰队来协助运输，大陆的炮当然不打第七舰队，大陆不愿意把内战变成国际战争。杜勒斯与大陆对抗，他为什么要蒋介石放弃金门？有金门牵制大陆不是很好嘛，照三角理论来讲的话，为什么杜勒斯不用？后来金门炮战这件事成为好几个美国畅销的国际战略教科书中的重要案例，大家研究蒋介石凭什么力量能把美国锁在金门这个问题上，让美国不得不低头？它成为美国人的困惑。其实对我们而言道理很简单，蒋介石要反攻大陆表示他的决心，把重兵放在那里。毛泽东后来就发明了“单打双不大”，两岸形成默契，两岸之间内战不停所以就不会发生台湾独立的情形。这道理在我们这个历史文化脉络里讲是一件非常常识的事情，美国人就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中国人在玩什么把戏？到1979年卡特政府和大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引发了一个辩论：美国是不是背弃了台湾？当时宋楚瑜在美国CBS电台上指问美国人（我记得是1982年8·17公报的时候）“where do you stand?”，美国人到地站在何方？他讲这个话的前提首先这是个道德问题，当时从1979年卡特政府到里根政府为了对付苏联人就要拉拢大陆，这是大三角战略，大陆假如不听华盛顿的话怎么办？就要想办法制衡大陆，最好的办法就是台湾，那为什么要放弃

台湾，说台湾是它的战略包袱？为什么整个思路从基辛格到布勒津斯基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包袱，要牵制苏联就要拉拢大陆，台湾在这里捣什么蛋。为什么没有想过用台湾牵制中国，让中国不得不成为美国牵制苏联的战略伙伴？一直到1990年中期才开始有意识的把台湾当作战略棋子，90年中期之前美国老觉的台湾是个包袱，关键在我看来还是和台湾有关。台湾一直把大陆当作是自己内战的敌人，觉得自己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美国要介入的话就会产生金门炮战的困惑，美国人两边不讨好。如果要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话台湾反对，要反对一个中国的话大陆反对台湾也反对。如果今天要支持台湾的话就变成美国要直接和大陆交涉它怎么支持台湾，台湾不会去和大陆交涉说美国怎么支持我，因为台湾不是要搞独立，台湾变成美国的战略包袱。但今天台湾表现出来说要搞台独，不要和大陆在一起，那美国人就可以用台湾做战略棋子来牵制大陆，这时美国人不必直接面对大陆，美国人没有支持台独，是台湾人自己要搞而已，美国人只是支持原来对台湾的防卫的义务而以，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变的是台湾，大陆不能怪美国人。所以当台湾开始要追求独立而且姿态非常明确的时候，美国人就可以把台湾当战略棋子，所以台湾变成美国的战略棋子和台湾对大陆政策和台湾的统独意识息息相关。这让我们在研究战略三角棋子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台湾之所以变成战略三角是因为台湾自己要变，台湾要变的时候人家还不让他变，不让他变它就在里边做了很多叛逆性的意想不到的行为，把自己的身价变到可以谈美、中、台战略三角的位置，原来没有这个位置现在变成有了，这就必须要我们重新思考战略三角理论之所以能用在美、中、台，现在不光是台湾的学者在用，连去台湾的美国学者也开始在用。每次在台湾开国际会议的时候都在谈，也有投台湾会议主办者所好在谈的，但谈起来也头头是道，让人觉得战略三角在台湾弥漫整个天空，谈两岸关系不能不谈战略三角。

这个理论我感觉是政治实践出来的结果，是台湾模拟自己作为战略三角的一罩它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当它武逆了美国人的意志的时候作为战略三角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李登辉可以是一个战略三角的模拟实践者，是他做出来了，告诉大家说你不要怕，大陆绝对不敢碰台湾，大陆是个纸老虎，因为美国盯着大陆，只要抓住美国就行，你放心好了。如果揭穿大陆是一个纸老虎，美国人还感谢你，你就变成是很重要的棋子，当你变成棋子的时候你就和它平起平坐了。李登辉实践他的理论，然后把实践用现实主义的战略三角理论来分析，就好像说他这个实践好像是战略三角理论理所当然得出的客观的战略。但如果从两岸关系和美国与台湾的关系来看的话其实并不是战略三角理论当然能得出来的政策。因为从蒋介石到蒋经国就没有要推动台独，美国就不会把它当成是个棋子。你是不是棋子，是不是可以结盟的对象，是和自己的内部有关而不是国际关系中的三罩彼此互动单纯可以决定的，而是和你这一罩具体内部关系有关系，即使今天台湾把自己的位置提升到某一种战略三角的位置，它也不会改变说它不把大陆当成是一个永久的、绝对的、持续的敌人，台湾不可能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战略枢纽的位置，那战略三角理论不就错了吗？因为根据战略三角理论任何理性的一罩要么把自己变成枢纽的位置就是挑拨美中关系把自己和大陆关系变好，这个不可能，要么就是让三边都维持正面的关系变成三边夹足关系，台湾也不会去做。那现实主义所预期的理性的战略执行者到底在什么地方？一方面我们讲台湾实际的政治把台湾提升到可以适用战略三角理论的对象，制造了战略三角理论；另一方面台湾的实践又破坏、颠覆了战略三角理论，因为它让战略三角理论应当有的战略弹性消失掉了，所以台湾实际的政治就影响到了国际政治学现实主义理论的运用。

这样看起来我们起码有两个案例可以显示：政治学的理论作为一种先进国家输出到落后国家拿来看待自己政治的一种政治学语境会改变当地政治社会对自己的认识、对政治策略的推动，另外一方面当地的政治事件会影响到政治学理论能不能被运用、如何被运用。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就会发现在两岸关系中的台湾政治学界，政治学，其实是政治人物、台湾的国家领导、政治学者的一种身份策略，这种身份策略也有它的理性叫做身份理性和西方国际关系政治学家现实主义所讲的理性或者是国内政治学家所讲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的选民的理性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身份理性凌驾于政策理性、政策偏好、权力均衡现实主义理性的情形目前在西方政治学里还听不到、看不到。我感觉这样的身份理性在中国研究中更加明显，今天如果把身份理性拿到政治学范畴中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到，起码在台湾政治学发展过程中它就无所不在的影响到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也影响到政治学的发展，从而我们可以结论说西方政治学被引进台湾之后，它变成台湾政治学者的一种身份策略，一方面改造台湾的身份政治，另一方面回过头来也改造了西方政治学的意义，这种改造迄今西方政治学界还意识不到、感觉不到。一方面感到很得意我们颠覆了它，它还不知道；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很悲伤，就是我们政治的运作在它整个话语的笼罩之下无法挣脱。

(2004-8-20 14:19:00 点击938)

[点击下载全文](#)

[关闭窗口](#)